



今年的保研关键期,比往年来得稍晚一些。大三学生孙浩(化名)回忆道,6月保研夏令营季刚开始,他便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消息:东部某原“985工程”高校宣布取消保研夏令营。几天前,孙浩刚向该高校寄出纸质申请材料,希望凭借专业第一名、科研和实践成果获得夏令营入营资格。他原以为自己会像往届学长、学姐一样提前“上岸”,但夏令营取消的消息来得猝不及防——“什么邮件也没收到,只能靠自己刷消息,感觉时运不济”。

另一边,作为排名并不靠前的“保研边缘人”,大三学生周婷(化名)连续投递了十几所高校,却只收到一份入营通知,还因与期末考试冲突不得不放弃。那段时间,她用“疲惫、焦虑、迷茫”来形容自己的夏令营之路。

随着9月预推免进入高峰期,孙浩和周婷也在紧张备战——夏令营骤然消失,往年能在夏天“提前上岸”的学生,如今都要加入预推免这场鏖战。不少学生在社交媒体上调侃,今年保研选手吃尽“时代黑利”。

夏令营与保研招生解绑,是更公平,还是更令人焦虑?夏令营取消后,保研将如何展开?这场突如其来的转折,让保研生态和学生命运的博弈同时上演。

“异化”的夏令营

在孙浩和周婷的学长、学姐们看来,保研夏令营曾经承载着光荣与梦想。孙浩所在的这所北京“双一流”高校,往年专业排名前三的学生几乎都能拿到心仪院校的夏令营优秀营员资格。孙浩举例说,他的一位直系学姐在去年7月便锁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优秀营员资格,整个暑期无需再奔波参加其他考核。

对往届学生来说,夏令营 offer(录取通知书)几乎等同于“提前上岸”,9月填报推免系统只是走个形式。

对高校而言,夏令营的设计初衷远不止于此。它原本是高校各个学院利用学科资源和导师优势,在更大范围推广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经验

的一种尝试。通过严格筛选,学生才能进入夏令营。在为期约一周的校园参观、学术交流、导师座谈及笔试面试中,高校既能提前吸引优质生源,也能全面考察学生综合素质。尤其对跨校、跨专业申请者而言,夏令营是一扇难得的了解学校、院系的窗口。

“一开始,我们确实很乐观、很系统地在做夏令营。那时,老师们对夏令营都充满激情。”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操太圣回忆道,在2015年前后该学院夏令营刚刚开始时,学院老师们不仅全程参与,还会特意留出时间,与自己心仪的学生单独交流。学生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接触导师,还能感受到学术氛围和研究方向,提前体验未来的学习生活。

然而,随着夏令营与招生挂钩,其功能和形式逐渐出现异化。

这种不平衡,首先表现在学生与学校的博弈上。在择校过程中,学生通常选择投递和参与多所夏令营,以在保研季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夏令营也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排名靠前的学生往往手握多个录取机会。

2021年,一位“双一流”高校教授曾在其博客中晒出被学生“放鸽子”的经历。该教授称,“学生在联系的时候各种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就差签卖身契了,一旦手握几个 offer 立马变了个人,完全不考虑给招生单位和老师带来的麻烦。”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2024年9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官网还曾发布《2024年度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推免招生不诚信名单通告》,通报了该院当年度推免招生选拔工作中,部分单方面违背承诺书相关条款的学生个人信息。

多位组织和参与过保研夏令营的高校教师告诉《中国科学报》,“未按承诺选择”的情况在保研夏令营中并不罕见。直到推免系统填报的最后一刻,学校仍无法确认学生是否会如约入校。即使大多数高校按比例划定“候选优秀营员”,但在部分院校专业的候补率高达40%、50%时,仍可能出现“补无可补”的尴尬局面。

在“放鸽子”现象日益普遍的情况下,有高校教师坦言,夏令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若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招生效果,便显得“劳民伤财”。

另外,夏令营也可能滋生潜在的不公。浙江大学科学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木洲告诉《中国科学报》:“在夏令营中,人为因素在其中的占比其实比较大,它不像统一考试那样以分数论高低。在这种情况下,制度难免存在漏洞,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招生公平。”

近年来,围绕夏令营的争议不断,关于它的追问也未停止:夏令营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走到尽头?

夏令营,办还是不办?

早在今年5月,保研夏令营就迎来骤变。5月13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通过邮件通知学生,按照上级最新要求,本次夏令营不再推进。随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也陆续宣布取消或撤回夏令营。一时间,学生眼中稳妥的保研“上岸”通道被关闭。

多位高校教师告诉《中国科学报》,教育相关部门并非明令禁止举办夏令营,但要求不得将夏令营与保研招生挂钩。在此框架下,各高校有一定选择不同路径的自主权。

今年暑期,多所高校选择彻底停办保研夏令营;部分学校则转型,将夏令营更名为“暑期学校”“暑期开放日”“暑期交流活动”等,强调学术交流和学科推广,不再与推免名额挂钩;还有高校通过线上宣讲吸引学生,但同样不涉及推免录取。

不同教师对此评价不一。李木洲表示,他所在的学院去年已尝试将夏令营与招生解绑,今年也已暂停举办。“从结果看,影响并不大。过去夏令营与预推免分散在不同阶段,现在集中到统一流程,反而更清晰。”在他看来,预推免本身就是一种相对成熟、相对严苛的评价方式,能够筛选出综合素质较高的学生。

曾参与早期夏令营招生工作的操太圣也认为,夏令营近年已显露疲态,学生频繁“放鸽子”,形式化色彩浓厚。“该来的学生最终还是来会。”在他看来,取消夏令营可以让招生回归统一流程,避免了投入与回报的不匹配。

但也有高校坚持继续举办夏令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便是少数延续夏令营的院系之一。

“关于办不办夏令营,我们内部讨论了很多。”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介绍,今年学院最终决定继续举办夏令营,但明确与招生解绑,坚持以学科宣传和学术交流为核心目标。“厦门大学教育学科没有本科生,夏令营能让学生接触学科、了解学院,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坚持的初衷。”

为了降低学生的经济负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仍为营员提供交通补贴、校内住宿和食堂伙食,还会准备夏季凉席和洗漱用品。

别敦荣说,即便参营学生最终没有选择报考厦门大学,夏令营依然值得举办。“花几万块钱,让几十个学生来参加夏令营,他们回去后就可能各地生根发芽。这种传播作用,能让学校和学科的影响力扩散得更远。”

在他看来,夏令营的意义之一是减少高校与学生双向选择的盲目性。过去,学生可以通过夏令营提前了解学校和学科,减少选择上的误判。如今,大量高校取消夏令营,可能使志愿填报与学科选择的盲目性增加。

可以预见,在制度尚未完全理顺的过渡期,新的矛盾还将浮现,学生、教师与学校都在试探新的平衡点。夏令营的骤然消失,并没有带走所有问题。

“机会少了,焦虑多了”

相比往届,今年的大三学生普遍感到“机会少了,焦虑多了”。

首先是夏令营数量与入营名额的锐减。过去,专业排名靠前的学生往往能收获多个入营通知,如今则明显收紧。即便是专业排名第一的孙浩,也没能像学长、学姐那样轻松获得七八个入营名额,他最终只参加了三个夏令营,其中还包括一个更名为“暑期交流”的项目。

“只要能参加,就有候补的机会。”他说。

对于“保研边缘人”周婷来说,今年保研季的压力更大。往年与她同样排名的学长、学姐能够入围的夏令营,今年名额几乎全部落在专业前三。

整个暑假,周婷只争取到一个某原“985工程”高校的入营机会,却因与期末考试冲突而不得不放弃。她介绍,如果选择参加夏令营,期末考试就必须缓考,而学校通常会将成绩折算为总分的85%至90%。由于保研学生的分差往往只是在小数点后几位,这样的折算可能直接影响最终排名乃至保研资格。身边不少成绩靠前的同学,为了稳住绩点和名次,也不敢轻易缓考,大多数不得不选择放弃一两个夏令营,或是“极限兼顾”。

周婷回忆,自己当时仍争取到一所高校的最终面试环节。由于该校坐落于另一座城市,且面试时间紧张紧最后一场期末考试,她的实际准备时间不到24小时。“难度和压力倍增,虽然准备不够充分、状态欠佳挺遗憾的,但只能尽力而为,争取一线机会。”她说。

其次,一些夏令营虽仍在举办活动,但形式已大不相同。孙浩参加的一场暑期交流活动吸纳近300名学生,他的个人面试时间不足10分钟,流程显得“有点草率”。营员被分为“卓越、优秀、合格”几类,但学校未明确说明这些评价与推免结果的关系,使学生难以判断实际影响。

这些延续夏令营的高校,多止于宣讲和学术交流,很少发放学生梦寐以求的“铁 offer”。

与此同时,经济负担也是学生参加夏令营和预推免面临的重要压力。许多高校不报销差旅费用,或仅对最终入学者进行补贴。对远赴外地的学生而言,这意味着额外支出;而线上宣讲缺乏互动,不少学生认为“意义不大”。

最后,夏令营的消失,减少了学生与导师的接触。李木洲指出,在夏令营的宣讲环节后,学生如对导师的研究方向感兴趣,仍可能通过校园交流环节继续接触。但预推免面试一结束,学生必须立即离场,几乎没有额外交流空间。

不仅是与导师的互动受到影响,学生对学校的双向考察也受到限制。孙浩担心,如果夏令营

的功能被压缩成预推免环节,学生对目标学校的了解可能不够充分。今年7月,他曾参加过东部一所原“985工程”高校的夏令营,校园的历史底蕴与浓厚学风都令他心动。但如果仅通过紧凑的预推免流程了解学校,学生难以充分体会校园氛围,也难以考察住宿、餐饮等情况。

在多重压力下,这一届保研学生的选择趋于保守。周婷坦言,在预推免阶段,她不敢轻易跨专业,学校选择也变得更为保守。身边一位排名第一的同学因夏令营“颗粒无收”,不断降低对学校档次的预期。

对此,一些专家提醒学生,不必过度放大转型期带来的焦虑。

李木洲指出,这种焦虑并非针对某个个体,而是伴随整体制度调整而出现的,因此其中的冲突或许没有想象中那样严重。

“今年夏令营突然取消,大家心态难免紧张。但从长期来看,保研招生走向统一流程已是大势所趋。即便前期有夏令营,后面两道关卡依然要过。”操太圣补充说。

重新审视保研本质

9月开学前,预推免已紧锣密鼓地展开。原本,夏令营相当于预推免前的“模拟考”,学生既能提前适应流程,也可能争取到较稳定的录取资格。如今,这一缓冲环节被挤压,所有压力集中在预推免的“短跑”阶段。而且,随着夏令营取消,预推免时间提前,两者出现了时间重叠。

经过一个暑假的准备,孙浩、周婷等“保研预备役”将关注重点放在预推免阶段。对他们而言,这既意味着保研学生要正视竞争的集中化,也意味着必须主动规划、提前布局。

“不管是夏令营还是预推免,其实评估看重的都是‘硬背景’和‘软背景’。”孙浩解释说,所谓“硬背景”,包括院校和专业排名等基础条件,“软背景”则涵盖科研成果、实践活动等综合素质。这两方面需要学生前三年的积累,在夏令营和预推免阶段基本已定型。

但对于预推免的时间安排,周婷也提出疑问:各高校期末成绩出具时间不统一,在提交成绩和排名时,有的学生递交前五个学期成绩,有的递交前六个学期成绩。这种不一致可能影响学生自我评估,也为竞争带来新的不公平。

高校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公平、规范和透明正是此次保研夏令营改革的出发点。操太圣指出:“最核心的是考试中体现的教育公平。考试制度本就是基于公平设计,让每位有条件的考生都能通过公平机制被筛选进入下一阶段学习。”

但相较为期三到五天的夏令营,预推免通常只持续一到两天。短短二十分钟的面试,就能决定一名学生未来数年的命运。如何在有限的预推免时间内,保障高校与学生双向了解的有效性?

多位专家建议,应在保障制度公平的前提下,确保推免面试环节有充分时间,考生与导师有更多交流机会,而不是流于形式。

别敦荣表示:“预推免的面试时间有限,招生条件和程序也有特定限制,学生与学校的双向了解通常停留在一般层面,不可能深入。但即便如此,它仍对招生质量和研究生培养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随着多所高校取消夏令营,高校宣传也面临新的挑战。对此,专家建议宣传应日常化、常态化。操太圣建议:“对本校学生而言,若能提前进入课题组,与导师建立联系,将有助于他们在研究生阶段更深入地开展科研。跨校学生会机会可能少一些,但同样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积极建立联系。”

基于此,别敦荣仍对夏令营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夏令营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终结,当其剥离招生功能,更本质的学术交流功能将继续发挥作用。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制度拐点上,学生和高校都在重新审视保研的本质:它不仅是竞争与筛选,更是探索与选择的过程。

企业“喊缺人”,学生“难对口”——京津冀同解机器人结构性“人才荒”

■本报见习记者 蒲雅杰

聚光灯下,银白色焊接机器人以毫米级精度舞动臂膀;不远处,一名学生正遥控一台履带式机械臂,缓缓抓起模拟危险品;一旁,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同步复现操作者的每一个手势,引得观众驻足拍照……

近日于北京亦庄举行的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览会上,“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汇聚了多家职业院校与一线企业的合作成果。他们将课堂搬进展厅,把实训成果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创新产品。

自2015年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创办以来,今年首度设立了“京津冀机器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协同发展”论坛。对此,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倍感欣喜。他呼吁,当前仍需要进一步打通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衔接堵点,避免出现企业“喊缺人”、学生“难对口”的局面。

人才结构性短缺日益凸显

当前,人工智能、生物仿生、新材料等前沿技术与机器人深度融合,机器人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在这场浪潮中,不少职业院校交出了亮眼的答卷。

超,不仅得益于技术与设计本身,还有千千万万扎根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与技能人才的助力。”张建军说道。

然而,这类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却日益凸显。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李智介绍,2025年前5个月,机器人产业相关职位数量同比增长6%,求职人数激增32%,但不少企业却仍高喊“缺人”。

“目前,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人才,就业对口率仍不理想。学生能进入大型企业发展的机会有限,人才培养质量也尚未完全赢得企业的认可。”李智坦言,一边是海量技能人才涌入就业市场,另一边是企业深陷高素质技能人才荒的窘境,这并非简单的“缺人”,而是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温差”的投射。

如今,机器人已不再是单一的机械臂,而是集感知、决策、执行于一体的智能系统。相应的,能够真正落地应用的技能人才,也必须具备技术的复合性与场景的适配性。

对此,李智指出,职业教育的定位必须精准对接产业的真实需求,不局限于培养普通的技术工人,而是涵盖三类核心人才:能准确操控机器人完成纳米级精度任务的技术工人,根据产业需求完成机器人系统集成的工程师,以及能解决机器人故障诊断、算法优化等实际问题的“战场型”技能人才。

然而,教育端的转型面临重重挑战。现场多位一线教师坦言,机器人技术迭代之快,早已远

超教材更新与专业设置的节奏。因此,教师能力提升、课程动态调整、实践教学强化已成为当务之急。更关键的是,产教之间的“双向流动”仍未打通——教师难以深入企业实践,企业高端人才也难以顺畅走进课堂。

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李泽东也道出痛点:“机器人的开发者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科研型,但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急需一个强有力的平台,将科研成果、企业转化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紧密串联,让高素质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跃升的坚实支点。

政策协同带来育人新生态

在新形势下,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带来了机器人行业人才培养新机遇。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石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而机器人产业是京津冀地区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框架“六链五群”中的“六链”之一,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尤其是职业院校三方形成合力,实现产业与职业教育的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论坛上,《京津冀职业教育机器人专业人才培养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发布,由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天津职业大学牵头实施,标志着三地职业教育在机器人领域迈入系统化协同新阶段。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李金生介



展区内,观众驻足了解铝合金焊接机器人和机器人机甲战队。主办方供图

绍,《行动计划》提出,将以全国首个面向机器人产业的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市区域产教联合体为基础,逐步吸纳京津冀地区约20家机器人龙头企业 and 20所职业院校,共同组建“京津冀职业教育机器人专业领域跨区域联合体”。

这一联合体首要聚焦的便是育人质量提升。未来三年,三地将聚焦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与运维应用等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和关键岗位,联合研制一套通用化、标准化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在此基础上,校企协同开发模块化课程体系、新形态教材与数字化教学资源,共建开放共享的教学资源库,真正实现课程内容与技术演进同步、教学标准与产业需求对接。

与此同时,企业还将主动向教师敞开大门——三地职业院校教师可依托专业优势,深入区域头部企业的生产一线,参与技术革新、工艺

优化与成果转化项目,在真实场景中锤炼能力,反哺教学。

这种从“单点探索”走向“系统集成”的发展模式,也让企业看到了破解“人才荒”的希望。

“以前在企业的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经常面临高水平、高素质技能人才本地招不到、外地引不来的困境。”百川机器人共享工厂总经理赵辉表示,今后,依托跨区域联合体,企业可以与更多的职业院校对接,使毕业生真正成为企业“即插即用”的技术骨干。

让技能人才离产业更近

《行动计划》最终还需扎根实践的土壤。李智指出,职业教育必须从“自说自话”转向“企业出题、学校答题、市场验题”的新模式。

这样的“出题”和“答题”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中悄然展开。赵辉介绍,他们通过打造一个“科技+生产”相融合的机器人共享工厂,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提供从原型样件到小批量生产的转化通道,同时也令职业院校的教学随之“前移”,直接嵌入产业链的真实环节。

“我们把产线上的痛点,变成课堂上的课题;把真实的技术难题,转化为学生的毕业设计任务。”赵辉表示,如今已有许多职业院校学生在企业技术骨干的指导下,参与机械结构优化、控制系统调试、智能算法应用等核心技术工作,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现能力跃升。

产教融合的最终答卷,将由市场来评判。“学校答题答得好不好,不看纸上成绩,而看毕业生能否迅速胜任岗位、企业是否认可其技能水平、市场是否真正需要这类人才。”李智说道。

他表示,还需持续跟踪毕业生的职业表现,将反馈数据反哺教学,推动学校动态优化课程内容与培养方式,如此才能不断提升人才供给的精准度,让职业教育真正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